



病榻憶往——宗陶老人自敘（五）

昌彼得 前國立故宮博物院副院長

十七、故宮專任

59年春，包遵彭館長因癌症去世。蔣院長即要我乘此機會辭館職，專任故宮，我尚猶疑不決。這時，我租住泰順街，是學生書局所購得的一棟四層樓磚房的第二樓，該層樓書局空著，以供屈公偶爾休息之用。承書局劉國瑞經理好意租我半棟兩房，只收房租500元。我以館中補助的房租，即可不用再掏腰包。後來蔣院長答允在外雙溪為我蓋間宿舍，我才同意辭去館職，專任故宮。中圖包遵彭館長去世後，館務由鮑幼玉暫代理館長。鮑兄是我中大的學弟，很快批准了我的辭呈。新館長到任後，他至教育部擔任國際文教處處長，其後任藝術學院（今之國立臺北藝術大學）籌備處主任，並任第一任校長。

我離職後，特藏組主任由喬衍琯兄續任，喬兄個性剛正，與李志鍾不能融洽相處，憤而辭職，去政大教書去了，由考試院曾霽虹先生接任。李志鍾做了二年，就回美去了，館務由教育部社教司司長謝又華暫兼代，之後由教育部長蔣彥士推薦諸家駿君繼任。中圖於50年代末經過鮑幼玉、李志鍾、謝又華，以及諸家駿或代理館長或擔任館長，於民國66年這才邀請聘大教授王振鵠先生接任館長，使得中圖的業務走向正軌，建造了中山南路20號的國圖新館。善本書可以全部開箱置架，方便閱覽。只可惜自美運回代管的北平圖書館102箱兩萬多冊的善本，被教育部移置故宮存放。

十八、辦了兩次短期季刊

我之能夠進入故宮，並不是管委會賞蔣院長的面子，而是獲得主任委員王雲五的支持。王主委是臺灣商務印書館的董事長，知道我懂一點目錄學與中國古籍，可以對商務印書館的出版有些幫忙。我到故宮上班之初，蔣院長交給我一包資料，是王主委交下的〈續修四庫提要稿〉，要我編目。這批提要稿是九一八事變後，日本軍閥利用庚子賠款設立東方文化事業總會，藉續修四庫全書之名，網羅一批中國學者撰寫提要，共完成三萬三千餘篇。這批原稿現存於中國科學院圖書館，商務所得的是借自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的油印本一萬多篇。王雲五想要出版，我花了一個多月，做《四庫總目》的分類，編排完成。後來商務將此書重新打字出版，精裝十三冊（含索引一冊），並加斷句，但我未曾寓目。所以此書的分類編排有錯誤，我應負責；至於標點斷句的錯誤（書中很多處），則不是我的責任，希讀者明察。後來，商務繼出版《四庫全書珍本初集》；後續影印了二集、三集、…以至十二集和別輯，都是命故宮圖書文獻處選輯的。

圖書文獻處成立後，蔣院長撥院廈一樓的右翼，作為開箱整理編目的辦公室。又設一間圖書室，對外開放；但外界人士來利用者甚少，只有稀稀疏疏的院中同仁來查資料。我為了想使收藏的圖書文獻為外界週知，與臺北文海出版社商洽，辦份季刊作宣傳。故宮臺北開館，器物處找得臺灣水泥公司贊助，出了一份《故宮季刊》，每期約

【特
載
一
】



百餘頁。但器物書畫的論文已多，能刊載圖書文獻的文章，每期有限。要想作宣傳，須另闢途徑。當時，臺北有個諺語：「你想害某人，就勸他辦雜誌。」是說辦雜誌是賠錢的事業。我與文海老闆李振華先生商談，勸他把眼光放遠，為國家、社會作點貢獻，獲得了他的同意，先出版《圖書季刊》。為了使季刊能久遠，我儘量地減少支出，但排印費無法省，能省的只有稿費。我每期選印一種傳世稀少的書，此可無需付稿費。年餘之後，再出一份《文獻季刊》。那時故宮的檔案已陸續整理出不少了。我選其中的有關臺灣史料，軍機檔中的黃教資料，陸續整理排印出來，這可以省稿費。總之，我節省支出，希望此兩份刊物能長存。再年餘之後，銷售仍無起色。那時正好整理出來一包袁世凱的奏摺，係宮中檔，100多件。我想近代的史料應該比較好銷售，我叫文海影印成10冊發售。不久，我去琉球那霸參加國際學術研討會。結束後，回到臺北松山機場，一下飛機，接機的同事即告訴我，有人向王主任委員密告，說我拿袁世凱的奏摺交文海出版，拿了好處。王主委下令將奏摺及兩份季刊，全部收回，由院發行。又稽查文海交出的收支帳單，並未發現我領取任何費用的紀錄。我聽了，當時非常氣憤，但季刊已經收回，申辯亦無法補救，只有忍氣吞聲，嚥下那口氣。我知道這兩份季刊，必有停刊的命運。院中自行出版，因經費不濟，不多時便相繼停刊了，這才是密告者真正的目的。公務員中流行的一句話：「多做多錯，少做少錯，不做不錯。」可以說是至理名言。此後，我做事就不那麼積極了。

十九、臺北成立阿爾泰學會

50年代是臺北阿爾泰學會最盛行的時期。所謂的阿爾泰學，是研究亞洲北方的民族、歷史、語言、文化。陳捷先兄自民國45年臺大歷史系畢

業後，赴美留學歸來，出任臺大歷史系的系主任。他的太太侯有蘭女士是滿人，所以捷先兄在學時，曾從廣祿教授學過滿文，造詣頗深。回國後，蔣院長聘他任故宮的顧問，指導同仁整理滿文奏摺與翻譯工作。他任系主任時，這時臺大教滿文有廣祿教授，教蒙古文的有札奇斯欽教授。在政大教維吾爾文（回文）的有阿不都拉委員，教藏文的有歐陽無畏喇嘛，另有一位金姓滿人教滿文。捷先兄為提倡阿爾泰學的研究，特成立阿爾泰學會，恭請文學院沈剛伯院長任會長，每年召開年會，有外國的學者前來出席。故宮藏有一部四十大冊的老滿文檔案，是滿清入關前的太祖、太宗的檔案，用老滿文記錄的，文字古奧難懂。清入關後，康熙、乾隆曾用後來的新滿文重寫，但對史料有很多的改纂。所以這部老滿文，是研究清入關前重要的研究資料。在北溝聯管處時代，李濟老用哈佛基金會名義向聯管處申請，攝影了顯微膠捲，那時是派李學智君帶同史語所照相技師李湫濤來攝影的。此微捲一直由李學智保管，廣祿教授指導李君翻譯。學會成立，外國學者向故宮建議，將此40大本檔冊影印流傳，以便海外學者們研究。故宮接受了建議，將滿文老檔影印為10冊，發行海內外。這一下觸怒了李學智，原來，他以為控制的微捲可以價值連城，奇貨可居；原書印出，則誰還要再看微捲。此後，他即處處找故宮的麻煩洩憤。我曾以私交的立場，寫了二封信勸他，他置之不理。在《新聞天地》之類的小雜誌上，連續發表了幾篇文章攻擊故宮，也批評陳捷先先生。我曾寫信明告李學智：故宮自故宮，陳捷先自陳捷先，批評故宮不等於批評陳捷先。他依然故我，繼續撰文批評故宮。我忍無可忍，最後寫了一篇〈總答李學智先生對故宮的批評〉的公開信，發表在《幼獅月刊》上，措辭嚴厲。不久，聽說李君辭職回大陸去了。



二十、參加「轉轉會」

轉轉會這名詞，我在臺中時未聽到過，遷來臺北後才知道。轉轉會是 12 位稍能飲酒的朋友組成，每月輪由一人作東，找尋味道不錯的小館，東邀聚會。大概在民國 50、60 年之交，師大教授王聿均學長，因他的轉轉會員一人去了美國，他邀我參加補缺。此轉轉會因經常有人出缺，參加之人變化頗大。而剛開始時，多找小館聚會。後來，漸漸找大館子，甚至後來隨餐廳的女經理而轉移。先是游舒婷經理多安排在她服務的四川館子，後來隨黃兆蓮經理而轉移，則多在江浙餐廳。轉轉會的會員變化也大，我記得早年的會員多善飲，正菜未上桌，僅幾碟小菜，3、4 瓶酒即已下肚。到了後來，酒量隨年齡都差了，終席能吃完兩瓶就不錯了。我與吳匡兄是始終會員，長達三、四十年而不變。到了 91 年，我因糖尿病開刀而退出。聽說此轉轉會仍在轉，不過人減少，已改為幾個月一轉。此種聚會，我覺得很有意思，朋友相聚談談時事，交換意見，亦人生一樂也。

廿一、結識歷史小說家高陽

我是如何認識高陽先生，完全記不起來，只知大概在 60 年代初期，就已經認識高陽了，可能是我們的共同朋友張佛千先生介紹而交往的。高陽姓許，名晏駢，浙江杭州人。高陽是筆名，大概取本姓的郡望，所謂「高陽許氏」是也。高陽民國 11 年生，小我一歲。他天資聰穎，文筆流暢，記憶力特強，能每天寫幾份報紙副刊連載而有條不紊。他的太太是空軍將領之女，而持家卻很節省。他們夫婦都很能燒幾樣可口小菜，經常邀幾位朋友到家小酌，我與張佛老都是他家的座上客。高陽喜飲，但不飲烈酒，經常是一瓶紹興酒當水。他無論到那裏，總是手握一瓶紹興酒，隨身帶著稿紙，停下來一邊寫稿，一邊喝酒。在他家中晚餐後，

如有牌搭子，即湊成一桌。但高陽不喜打牌，餐後即忙著寫他的連載小說。他的歷史小說，所述皆有憑有據，而不是杜撰。聽說他把《清實錄》中的資料，製作成資料卡，貯存卡櫃中，需要時即檢出參考。我雖未見到他的資料卡櫃，但他小說中所引的奏議，都是出自原件，應該是可信的。蔣院長也是一位高陽迷，每天報紙上的連載，他都抽暇閱過。有一天，他問我認不認識高陽？我說很熟。他即要我帶來談談。蔣院長雖是海寧人，但住在杭州，所以對杭州的掌故熟悉。有天，高陽來看我，即引見蔣院長，他們聊了一個多小時，辭出時，好像聊得甚為愉快。

當年的報紙連載小說，最出名的，除了高陽以外，再就是香港寫武俠小說的金庸。他們兩人都光憑稿費，而有豐富的收入。但高陽經常鬧窮，聽說他向報館預支欠錢甚多。有時，也來我處臨時調個三、五萬頭寸。他很有信用，說幾時幾個月還到時準即奉還，還一定要加上利息。我曾勸他說，我朋友中收入以他最高，但他最窮，經常青黃不接。寫胡慶餘堂紅頂商人胡雪巖的發跡，頭頭是道。而到自己理會，卻毫無章法。但言者諄諄，聽者藐藐，他依然如故。陳捷先教授是研究清史，與高陽也很談得來。有一年，捷兄借調臺南成功大學任歷史系主任，對臺南貢獻很大。成大學生知道拓碑，是捷先邀故宮拓銅器銘文技師張銀武去教的。有次捷先邀高陽去成大講演，我隨行做陪。他住旅社，我住成大的宿舍。我去旅館看他，他左手執紹興酒，右手寫稿。他口才很好，講演可以說出口成章。他不喜歡打麻將，外邊傳說他能一邊打牌，一邊寫稿（見汪珏女士，《流光徘徊》），應是誤傳。有一次，他約幾個朋友，在他家小酌。飯後，有幾位朋友湊成一桌，他即忙於寫稿。牌桌上一家清一色，一家三素，只有我碰出了一副風字。張佛老出牌說：「昌公你最小，頂多對對胡。」哪曉得

【特載】



我胡的全桌最大。張佛老即席作了一副對聯：「舉杯必乾，和牌必大；讀書務博，考訂務精。」他自謙字不好，後來請莊嚴老夫子書寫送我，我很喜歡，經常掛在客廳。民國 73 年我任副院長後，事忙就很少與高陽飲酒聊天了。81 年他病故時，我因內人癌症病危住榮總，他的出殯我都没能前往弔唁，一直感到遺憾。

廿二、我與蔣院長紅過一次臉

我自出校門，一直追隨蔣慰堂院長。我與他長公子祖安同庚，所以我一直以父執輩對待蔣院長，他也一直以子侄看待我，可以說無話不談。民國 67 年，美國普林斯頓大學獲得美國政府教育部的贊助，想把所藏的中文舊籍，繼善本編印目錄之後，也編印目錄。普大計畫兩年完成，童世綱館長邀請我擔任。兩年的時間太長，我不可能請准假。

他們的藏書約 10 萬冊，我估計趕一趕，一年應可完成。商量既定，我向蔣院長請假，他不批准，並加一句話說：「沒有處長可以請假一年的。」我聽了怒氣上沖，反唇答覆，我說：「院長！你不批准，我可諒解。若說沒有處長可以請假一年的，我可不服氣。書畫處處長江兆申，怎麼可以出國進修一年，還帶職帶薪。他是葉公超常委介紹來的，後台硬。」我一講完，就氣沖沖的回到辦公室。從此避不見他的面，每週的院會，我都請同仁代為出席。他的機要秘書黃敏惠見事鬧僵，從中調停。最後，商得雙方各讓一步，去美分成兩段，一年去 6 個月。我也商得童館長的同意，第一年，我 4 月 1 日去，10 月底返。第二年因故宮規劃第三期的擴建，我一時走不開，請同仁吳哲夫先生代我去工作 4 個月。最後兩個月，我再去收尾。